

觀察

· 每份一角五分 ·

日一十月九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 ·

期三第



卷五第

信 | 通 | 察 | 觀

投考

與密理根教授的一席談

文藝

週末欄

看一角糜爛的內地

(川東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報導

(迪化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半年來新疆情形綜合

(錦州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范漢傑與遼西戰場

知識·生活·宇宙

劉緒貽

生活與文化

印度獨立一年

The New Statesman

外論選譯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張東蓀

特稿連載

國法與校章之間
論現行法律教育制度
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

樓邦彥

徐道鄰

潘光旦

專論

訂閱價目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127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考胡同二號
 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三個月：掛號寄一元八角，平寄一元六角
 六個月：掛號寄二元八角，平寄二元六角
 一年：掛號寄五元五角，平寄五元
 航空掛號：每份加五角
 郵資：國內每份五分，國外每份一角
 廣告：第一二三卷每冊二元，第四卷每冊四元
 封底：全色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單面四十五元
 普通：全色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單面四十五元
 通：全色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單面四十五元
 照：全色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單面四十五元
 掛號：每份五分
 航空：每份加五角
 郵資：國內每份五分，國外每份一角
 廣告：第一二三卷每冊二元，第四卷每冊四元
 封底：全色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單面四十五元
 普通：全色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單面四十五元
 通：全色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單面四十五元
 照：全色一百四十元，半面八十元，單面四十五元

定戶注意

讀者惠顧請認明本報地址，務請註明定戶姓名，否則無從送報。



前夕！

編者先生：華北學生反對特刑庭成立不過兩個月，政府終於攤出這張王牌，以「職業學生」為罪狀，化非法為合法，不問證據，大肆拘捕，繼之教部以「開除」令各校，遂使政治干涉教育益形表面化！

天津兩地拘捕名單總額四百餘人，有的先公佈名單然後「傳訊」，有的於深夜逕入學校或家宅拘捕，而天津因無特刑庭之設，所以不得不暫在警備司令部拘押，暫歸軍法偵審。邇來當局為此，時而提前戒嚴，時而加強檢查，防戒逾恆，為對付幾個學生，亦可謂大費苦心了。

有人批評當局此項是背水一戰，其結果則是「逼上梁山」。據非正式估計，列入名單或其他因懼怕而逃逸者，已不下五百人，（因時有二批三批名單之傳聞）這批人大都是自治會新舊理事，或平素愛說話有正義感的人，原先倒不見得「為匪作倀」，而今却迫而「被匪利用」。如果照他們的作事能力言，半屬各校精華，假如全數逃入「匪區」，想像中可能會起不太小的作用，政府苦心孤詣造就這一批人才，竟而落得此種結果，亦大可悲！

我是名題金榜的一個。不錯，我作過自治會理事，但這算犯罪嗎？相反的，全校百分之七十的同學在選票上圈上我的名字，我却認為是莫大光榮。我參加過社團，曾有過集體生活，小組學習，難道現代教育非停留在孤單的課本上學習不可嗎？啊，我參加過抗暴、反內戰、反迫害簽名和遊行行列，我先不論本身的正義感衝動和真理價值來衡量，一個現代青年還會熱

無視嗎？

是的，我是一個超過廿歲的青年，我有理智分辨是非善惡，我既不會誘致他人，更不願受他人惑感（如果當局說我受騙而不覺，那我認為就不值一駁了）我認識時代趨向，我看清社會罪惡，我更關心人民疾苦和國家前途，在自由平等真諦下，我有權力思想，我更有權利表示！

然而現在完了，差一年即將畢業的學校，已被迫離開，我試走過知己同學和親戚的家，甚至企求找一件小事暫時苟安，但現實的答覆是不可能！他們都因報紙上公佈過我的尊名而不敢收留。我徘徊，我徬徨，但終於找出了我唯一的道路——不是找出，是迫使我去走上這條路！身受和感覺到的事實，遠過於任何書本上的理論！

雖然，感情挽繫着我對現實的幻想，隨性愛憶着傳聞中物質的痛苦，然而這些基於個人觀點而出發的意識，終將隨現實的考驗而被揚棄，巴金說：『我珍貴我的痛苦，因為痛苦是我的力量，痛苦是我的驕傲：』是的，我願以今天起開始一個痛苦的嚐試，並且盡情的，毫無忌憚的馳騁在廣大華北平原上！

林冲於天津、時在冀中行前夕

巴黎來函

編者先生：勝利以來，國內諸事失軌，各地學生運動屢有所聞。尤以最近北平昆明兩地發生流血事件，海外僑胞聞訊之下，不勝痛心憤懣。青年學生為一國之柱，我國八年抗戰，瘡痍滿目，百廢待興，尤宜愛惜培植，學生運動在中華建國史上向佔重要地位，五四運動，一二九學生運動等對民族前途均有不可磨滅之功績。今自民國廿五年之抗議美軍暴行，廿六年夏之反饑餓反內戰，以至最近之反美扶日運動，均係發揚前人一貫精神，以全民族之生存為前提，實堪敬佩。吾人僑居海外，不能親身參加，惟深知國內師生雖處境

困苦，尤能領導民衆，抵抗暴力，主持正義。謹盡棉力，發起大規模之募捐運動以為國內學運之支援。茲宣言如左：

- 一、對全國困苦門爭之師生致敬
- 二、對政府之措施提出抗議
- 三、對全國同胞呼籲一致為學運支援

旅法華僑團體支援國內學運聯合會啓
一九四八年八月廿日 巴黎

考生控訴

編者先生：此次北方三校在漢招生，清華僅錄取廿五名。考生既如此之多，落榜者竟有特殊優異之學生。如今後不能設法多收幾名學生，則真令青年失望。武大目前尚未放榜，聞僅可能錄取四百人。井據外間一般傳說，青年軍將有二百名保送者。果爾，則考生辛辛苦苦，真無代價。大學實非收容所，政府焉得如此做法？無怪青年憤懣。

閔思彥 八月廿七日 武昌

編者先生：我是個投考大學的學生，在上海我曾先後考過四五個學校，其中一個是英士大學。近見報載：英大本學期在上海南昌等三地招考錄取總額，僅一百六十名，因為教育部要分發青年軍二百餘名。但上海等三地投考者，約在萬人左右。學校所能容納的名額和學生投考的名額一比，本已少得可憐，現在還要將一部分名額分與特殊青年，真是不平之至。

胡英民 八月廿九日 南京

編輯先生：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從老遠的南方跑到杭州來投考國立藝專。到

杭後，距離放試的時間還有幾十天，我就借住在他們學校裏，在自治會所主辦的投考同學服務社補習繪畫；（他們學校裏還有一個服務團體所謂研習會，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及青年軍同學辦的。）在這幾十天裏，我一直埋頭學習，所以進步很快，從老師和教授的口中說起來，成績要算投考者中最好的了！放試過後，自信各科成績都取得相當不錯，可是發榜了，榜上竟沒有我的名字。

後來從某些教授的口中傳出了一部分的真相，這一次取錄新生完全是由該校長汪日章一人圈定，而他圈定的標準是根據研習會平日對投考者調查觀察。所謂招生委員會的開會決定，只是一個幌子。招生委員會原定下午三時開會，汪校長五時四十分才來，將他圈定的名單讀一下了事，有教授提出要對成績，他却說：『我已經對好了，馬上就要吃晚飯，不必耽擱時間！』

我壓抑了自己的感情，和另外的幾個落榜者去見汪校長，要求查看成績，如果及格的話，就給予試讀或旁聽。汪校長當即承認我們的成績很好，不過思想有問題，而且說要進來是可以的，只是要我們去要求青年軍和青年團的同學担保，並且他還說：『這裏是國民黨統制區，國立學校就是國民黨辦的學校，我們一切都得服從國民黨！』

再說：我們這批落榜者大都是家境貧寒，歸家的路途遙遠，想盡了辦法才籌得來杭投考的旅費，而現在家中的匯款尚未到，只好再在這裏借住幾天。可是在廿四日的半夜，訓導處竟一行數人氣勢兇兇地來到宿舍，迫令我們馬上遷出，在此深夜，又下着大雨，許多同學竟被捲起被子趕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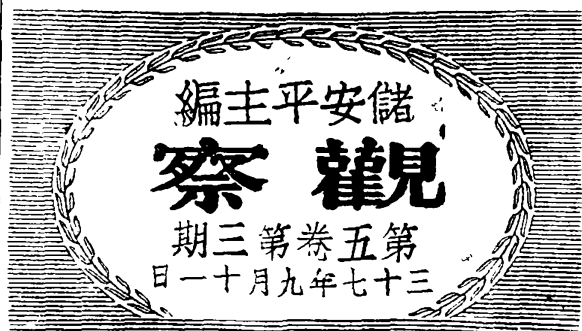
編輯先生：寫到這裏我真要流下淚來，我不知道這是人間還是地獄！汪氏身為專科學校校長，到底是辦教育呢？還是摧殘教育！是教育青年呢？還是迫害青年！所謂學術自由在那裏？黨派退出學校又作何解釋？……

投考藝專落榜者 八月廿六日 杭州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 徐道鄰：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
-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 劉緒焄：武漢大學副教授
- 何永信：
- 曾巖發：

國法與校章之間

樓邦彥

一個問題，一件事情，總是有好多方面的，這好多方面的重要性程度，却未必以是否受人注意而為定。譬如拿最近政府當局在各地拘傳大批學生一事來說，政府自然把它看做在戡亂期間為清除「匪諜」的必要措施，但在不滿意政府這種措施的人們看來，它是一個法律問題，它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它也是一個有關教育的問題。我在此姑以一個研究公法的從事教育工作者的地位，來探討這件事並不能算小的事情，提出一個或許尚未為人十分注意的國法與校章之間的問題。本文的目的祇是在把問題提出來，我自己尚未有肯定的結論，不過希望大家對這問題來作一番思考而已。

我相信在每一個從事教育工作者的眼光中，政府此次的措施，無論就規模或方式來說，確實是空前的。它比澆水龍，非刑拷打，或竟致用達姆彈槍殺，都要嚴重，因為它不但抹煞了人權，而且摧殘了整個的教育。

根據報載消息，各地憲警當局對於被拘傳的學生都是採取直接的行動，到學校執行搜捕的，其唯一的例外就是北京大學。明眼人一定會看得很清楚，在中國的社會裏，並處於現實的情勢下，這裏面當然包含着很多複雜微妙的因素，我們姑且不在此贅述。不過我們略有所聞，北大所受到外面的壓力也並不小，其演變的結果，可能是因為情勢的迫切，學校方面鑄下了一個因小失大的錯誤。我想用下面所抄的幾段文字來加說明。

八月二十二日，北大出了佈字第二十八號的一個佈告，其原文，除略去學生的姓名外，如下：

「這次特種刑事法庭先後傳訊本校學生……等四十八人，我們已經屢次表示，希望他們自行到案，必要時可由學校人員陪同到庭，並由學校代請法律顧問。現在已經到庭經過問訊回校的已有好幾位。我們現在很誠懇的希望尚未到案的同學，務必認清當前的環境，顧念自己的前途，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以前到訓導處報到，由本校派員陪往特種刑事法庭。經過詢問後當即由本校設法具保。其過期不報到者，學校一律停止其學籍。此佈。」

翌日晚，胡適校長致函北平警備部陳繼承總司令，表明學校的態度，其原文如下：

「繼承先生：此次特種刑事法庭傳訊的北平學生五十人，除×××，×××並無其人外，共四十八人。此四十八人已經本校負責高級人員詳細調查，結果如下：（一）已赴法庭報到者六人……（二）即赴法庭報到者一人……（三）已經本校於七月二十一日榜示開除學籍者三人……（四）確知已經離校南下者七人……（五）已經離校者二人……（六）已經畢業在外就業或實習者四人……（七）不在宿舍者二十五人……以上調查之結果，均由本校訓導長等以書面向我負責報告……我們現在正查明凡確在北平而避不到案之本平學生，均一律停止其學籍，決不許其註冊，亦決不許其潛居學校內活動。我很誠懇的希望先生與貴部同人相信我的報告與保證。弟胡適敬上。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

二十四日，北平憲警當局的負責大員親赴北大訪問胡適校長，並在各院巡視一番；跟着就是陳繼承總司令的覆函如下

「適之先生：收到先生二十三日的信，關於特種刑庭傳拘學生的事，治安機關有協助執行的責任。先生負責保證貴校被拘傳的除到案的以外，已無他人在校，我們當然相信，並據憲警負責人報告，他們已進校看過，調查的結果與先生調查的一樣。我們希望凡確知不在北平的學生，請學校方面轉知他們從速到當地法庭投案，否則也一樣開除學籍。如果他們或他們的同黨再在學校活動，負有司法警察任務的憲警將根據職權隨時到學校逮捕。這是該先向先生聲明的。敬祝健康。陳繼承敬上。八月二十四日。」

別的姑先不談，我願意大家注意一個國法與校章的關係的問題。胡適校長的信內說：「我們現在正查明凡確在北平而避不到案之本平學生，均一律停止其學籍，決不許其註冊，亦決不許其潛居學校內活動」；陳繼承總司令的信內也說：「我們希望凡確知不在北平的學生，請學校方面轉知他們從速到當地法庭投案，否則也一樣開除學籍」。固然，嚴格地說

「停止學籍與「開除」學籍是學校對於學生的不同性質的處分，而兩封信的不同用詞也自然各有用意，我倒並非要在這方面有所發揮，我所要指出的是北大所創下的一個違背教育原則的先例，這就是說，學生的學籍問題為校外政府機關的決定所支配，這豈非教育的獨立性受到了打擊麼？最近又據報載，教育部訓令各校當局，凡被特種刑事法庭拘傳指控的學生，學校當局應即一律將其開除學籍。這與北大的最近措施是否有因果關係，我們不從而知，不過無論如何，我敢說，這無疑是教育與政治重又打成一片的開端。

國法人人皆應遵守，這是任何法治國家的一個不變的法則。一個人除他是國民外，又可能是社團的組成份子，或學校的學生，那麼他不但受國法的約束，他又受他所屬的社團規約的約束，或受他就讀的學校校章的約束。如同國家具有它的特性，社團與學校也具有它們的特性；兩者容或有共同的地方，然而我們不能忽略了它們互相不一致之處。學生品行不端，固然可以同時觸犯國法並違犯校章，然而觸犯國法與違犯校章未必總是一致的。某一學生的行為觸犯了國法，却未必同時違犯了校章，同樣的，他的行為違犯了校章，也未必同時觸犯了國法。試舉幾個淺顯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同時觸犯國法並違犯校章。假使某一學生做了搶奪強盜的行為，那麼他不但觸犯了國家的刑律而應受處罰，而且學校也可以考慮他的品行已經不端到應受處分（記過或開除學籍）的程度。這個時候，國法與校章可以說是一致了。

第二個例子是觸犯國法而未違犯校章。其較輕者如某一學生因違警（如妨害安甯，妨害交通……等）而受國法（違警罰法）的制裁，學校則儘可以不考慮他的應否受處分問題。其較嚴重者如某一學生做了妨害名譽或侵佔的行為，那麼他雖然觸犯了國家的刑律而應受處罰，學校仍可以認為他的品行並未不端到非受處分不可的程度。這是國法與校章不一致的一種情形。

第三個例子是違犯校章而未觸犯國法。假使某一學生功課不佳或不斷無故缺課，學校當然可以依據校章加以處分，這處分或許竟然是開除學籍，但是他並未觸犯任何國法，在理論上他依舊可以是一個良好的國民。這是國法與校章

不一致的又一種情形。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國法與校章完全是兩回事。不但觸犯國法不一定違犯校章，或違犯校章不一定觸犯國法，就是同時觸犯國法並違犯校章，學校對於行為者的學生的處分，並非由於他受了國法的制裁。唯其是這樣，教育才不致與政治打成一片，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獨立性也才可以維持。

我不反對學校光明正大處理阻止憲警當局隨時到學校逮捕學生，但是真正到了無理可講，無保障可請求的時候，我不主張學校為了維護表面上不被侵犯學校的清白的理由，竟然濫用正直的校章去遷就法律上或訂成問題的論法，因為我們尚應認清這個亂糟糟時代的現實。當今之時，政府要我們遵守的法不一定個個都是好法（好法就是大家所要的法），而且法的執行也不一定條件都合乎正義的條件（因為我們尚未建立健全的人民控制政府的制度）。處在這樣的環境中，祇容客觀的情形允許，尤其是對於政治性的問題，學校應該極力保持中立的地位，庶幾它能常常超越時代去注視較遠的景象，這才不負教育對於國家的使命與貢獻。政府如果決意不顧時代的要求，從而破壞學校的獨立地位，抹殺教育對於國家的可能貢獻，那麼政府祇能自食其果，自負其責。這樣的政府已經走上了極權之路，若再有維護學校清白之念，那簡直是狂妄的想法。

說到現實，未免牽涉得太廣，可是對於正確的概念，我們却不能避免而不加以認識。國民與學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身分，國法與校章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約束，非水與河水不能相混雜。國法與校章之間橫着一道鴻溝，違法的國民仍舊可以是一個優秀的學生，犯規的學生也仍舊可以是一個良好的國民。國家與學校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生活，受制於兩種不同的規範。正好像兒子做了觸犯國法的行為，政府不能強制改變父親同他的關係，政府又怎能因為學生觸犯了國法，而強制改變學校同他的關係？

我不敢說以上是我肯定的結論，可是我總覺得「國法與校章之間」應該是一個亟待澄清解決的問題。

卅七年九月二日北平。

論現行法律教育制度

徐道鄰

談起現在我國的法律教育，恐怕一般人都是在搖頭。茲擬就整個教育環境及個別學校的特殊情形不論，專就法律教育的制度方面，略為檢討如下：

一、分組問題

現行的分組制度，係根據教育部卅四年十月六日公布之法律學系科目表。其說明中第二項，謂凡設備欠缺或不便分組者，可採混合制。足見教育部的理

想，是要分組的。而其分組凡四：（一）司法組，（二）行政法學組，（三）國際法學組，（四）理論法學組。

法律教育之分組，其理論當否，姑不具論，然此制度之實際作用何在，則殊難使人體會。若云依組分班乎；則如司法組有學生九十名（以高考及就業關係，目前司法組學生佔最多數），國際法學組有學生八名，而其共同科目，至少有一百一十三個學分（法學院必修科目至少五十學分，各組共同必修課目至

少六十三學分)。在此同樣科目授課時，將必使九十人為一班，而其他八人為一班乎？若云依組限定教員名額：則如甲校祇設兩組，而學生甚多，每年級皆開雙班或三班，（如全校為七百人）乙校設有三組，而學生甚少，每班不過二十人（如全校為二百人），然則乙校教員，應較甲校仍多三分之一乎（如甲校十二人，則乙校應為十八人）？若云依分組性質以聘請教員：則不設國際法學組者，可以不聘國際法教員不開國際法，不設理論法學組者，可以不聘法理學教員不開法理學乎？

再就學生方面說，這四個組，雖同屬於法律學，而其學術性質，工作環境，實相去甚遠，學生們才進大學，對法律學本身為何物，尚未十分明瞭，而即欲其選擇分組，不亦難乎？（四五歲小孩，嚷着身體不舒服要看病，而要他指定腸胃科，神經科，分泌科，豈非笑話？）且大學教育，本為學術研究，設備、師資及環境，在在足以左右學生們研究的興趣。今如司法組學生提出一國際法論文，或理論法學組學生提出一訴訟法論文，在學校方面將不予審查乎，抑使之轉組乎？抑根本不理會分組問題乎？

惟一看出來的分組作用，就是各組的科目表，而此表則又大成問題。例如司法組的必修科目，無土地法及勞工法，請問律師法官遇見了這種案子怎麼辦？司政法學組的必修科目無訴訟法，請問不懂行政救濟的，算不算行政法學專家，設學過訴訟法的人，能不能懂得行政救濟？理論法學組的必修科目，第一項是商事法，而中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制思想史和西洋法制史，反屬逆修，誠不知此中奧理所在！又有許多科目，開下來很好看，而現在中國能教授這些科目的有幾個人？如所謂比較行政法、國際行政法、比較憲法、立法原理、比較法學緒論、比較民法等等，請問在歐美先進的國家，那們個大學裏，經常的開過這幾門功課？在那個大學裏，這幾門是某種考試的必修課程？

我以為法學分組，祇有在一種情形之下，是有意義和必需。就是在學生提出畢業論文後口試時，可以依其所屬組的不同，而對他們考試科目的要求，分別的予以提高或減低。不過各組的科目，還須詳細斟酌。而我以為司法組內的民法刑法，不妨分開，而法史學則似應另成一組。

二、公共科目問題

在法律系必修科目中，有所謂法學院共同必修科目，（教育部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頒布，三十三年八月修訂）計有三民主義、倫理學、國文、外國文、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哲學概論、理則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普通心理學等十二門科目，總計至少五十二個學分（事實上為選就教師排課，學分超出此數甚多）。這些科目，有的是為補充中學時代的欠缺，有的是為法律者比較上應有的常識，其用意未嘗不佳，但是事實上，教員和學生，都認為它們是些次要科目，認為它們是些『苛捐雜稅』，學生們多敷衍例缺課，教員們大半無精打采，到了學期終了，學生得學分，教員支薪水，耗費的是時間人力和物

力。學校、教員和學生方面，為這十二門科目的負擔，和學生實際的收穫，這個比例的惡劣，凡是法律系的教員和學生間，實是盡人皆知。

我的意見：這十二門科目，最好一律改為選修，而由學生們任選二門，最好在第二三學年裏面去修，學生自知用功，教員自然起勁，這樣上課才有意義。否則本不必開課，而定作考試課目，指定教員作讀書指導，我保險學期考試的試卷成績，不會比現在差，而學生的功課表上，不至於像現在這般擠，以剝奪了學生們自修的時間，而免得教員和學生，在課堂上受罪！

三、主要法律科目問題

法律教育中民法刑法的重要，是不須詳說的。但是看一看我們的科目表，在四個整個學年裏，民法最多不過佔二十六個學分，可能祇是十九個學分；刑法最多不過佔十二個學分，可能祇是八個學分。換言之，一個法律系的學生，學校對他的要求，和供給他學習的機會，債篇總論和世界通史，是完全一樣的，刑法總論和哲學概論或什麼心理學，是相差不多。就制度上而言，法學生讀四年的法律學，對於民法刑法的下過的功夫，不過是各上過一次課，和參加過一次學期考試而已。學校既不作比其他科目更切實更深刻的要求，也不給他們可以作更切實更深刻研究的機會和設備。請大家想一想，法律中的民法和刑法，是不是聽過一次講和參加過一次期考，就可以算『學會』了？學工的學生，總要到工廠實習，學醫的要到病房，學科學的要到實驗室，以考驗其對學理了解如何，而學法律的學生，對於他們作基礎的人刑法，祇是上過一次課而已，天下哪有是理？

我在同濟法學院裏，為曾經聽過了民法的學生，開過一次講習班，是請薛祖光先生主講的。算是選修科目，可是要經過薛先生口試認可後才許參加。有些學生，原來自以為已『通』民法的，旁聽了幾次之後，方知道過去根本沒有摸着門。這個講習班收穫很好，很多學生要求多開些這類的講習班。（本來在德國和瑞士的大學裏，上課和本沒有考試，只有在參加司法官考試和博士考試時，要提出至少五個參加過這類講習班的證明文件。）

四、國文和外國文問題

現在一般大學畢業生，無論什麼學科，除非家庭環境特殊，論國文：一個個文字欠通，字體惡劣，白字連篇，典故亂用。論外國文：則既不能說，又不能看，更不能寫。佔去小學中學裏多少時間，消耗了青年多少精神氣力與來的，一點外國文，經過了大學四五年的教育，而終於歸正寢。尤其國文的不佳，使學生到了社會裏，處處吃虧碰壁。這個缺點和危機，法學院的同學們，沒有一個不深切了解的。

我認為在學校方面，在大學生四五年的讀書期間，應該經常的給他們繼續補習國文和外國文的機會。我在同濟法學院裏，每班次皆有國文班，德文班和英文班。不但是定為選修科目由學生自由參加，並且還有考試成績好即計算學

分，成績不及格即不算學分的優待。一律用小班次，每十餘人成一班，習國文的每個人皆要作文，習外國文的每個人皆要說話。學生參加的興趣，和實際學習的收穫，令人相當滿意。

婦女問題的一個總答覆

潘光旦

婦女運動，自從一七九二年英國窩爾斯東克夫脫女士 (Mary Wollstonecraft) 發表她的「女權宣言」以後，到如今可以說有過兩個時期，而前途可能的進入第三個時期。第一個可以叫做抗議時期。好比宗教革命以後，新的耶穌教派對舊的天主教稱為抗議教一樣。第二個時期可以叫做解放時期；抗議相當成功以後，女子在社會與文化裏得以自由活動，至少，實際上雖然有種種限制，法律上的種種限制早就幾乎完全不再存在。我們目前就在這時期裏。這兩個時期先後都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但也產生了不少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婦女自身的，也有關於社會一般的，例如家庭組織的動搖與子女教養的欠缺等。要運動的結果不但使婦女問題自身能比較長久的不再成為問題，並且使全般社會與民族不再受不良的影響，而發生新問題，我認爲我們應當進一步的導引它，控制它，以入於第三個時期，我這裏稱它爲位育的時期。

在前兩個時期裏，我們對於婦女問題有過四個不同的論點，兩個屬於抗議時期，兩個屬於解放時期。屬於前者的，(一)是與男子抗衡；(二)是對家庭革命；屬於後者的，(三)是爭個人人格，(四)是應社會需求。在第三個時期裏，我們應當有的新論點是(五)促進女性健康。此外可能還有別的，不過有此五個，似已足夠概括了。這五個論點也可以說是建築在三種不同的自覺上的，一二的基礎是「女子也是人」的自覺；三四的基礎是「每一個女子也是一個箇人」的自覺；非等到大部份的女子，至少是受過教育的女子，有「女子屬於女性，與男性根本上有些不同」的自覺，那第五個論點就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也不會有發人深省與解決問題的力量。

第一個論點，與男子抗衡，顯然是最早的。在父系以至於父權的社會裏，一半因爲積習，一半也未始不由於自然的趨勢，一種重男輕女的局面是極容易養成的。我說積習，是誰都知道的；我說自然的趨勢，怕就有人不能同意。其實這趨勢是最明顯的。陰陽兩性的分化原是一個有機演化的事實，遠在人類登場以前，便有過極悠久的歷史。性的基本功能原在生育，而一經分化，兩性對於生育的責任便有輕重懸殊的分別，這是表面上誰都看得見的；看不見的是，爲了適應此種不同的責任，兩性在一般的生理上也就發生了根本的差別，就最基本的代謝作用而論，陽性是許多於代，陰性是代多於謝；在後者，唯其代多，所以能負起艱苦的生育責任；在前者，唯其謝多，所以才會有種種社會活動與文化事業的表現；也可以說，唯其謝多，唯其於生育之外，尚有多量的餘力，才終於造成了父權的社會，造成了一種近乎男子獨佔的局面。我所謂自然的趨勢就是這一派演化的經過。我認爲研究婦女問題時，我們於積習之外，必須承認這一層自然演化的過程，積習固然不健全，特別是對於女子，理應改革，就女子一方面而言，更理應抗議，但自然的趨勢却是抗議不來的事。近人一部分關於婦女運動的著作，往往不明此理，以爲女子社會地位的低落的安排；例如，德人凡爾丁 (Vaerting) 夫婦所著「男女特性比較論」和陳東原君所著

以上四個制度上的問題，想大家一般都感覺得到的。今天我特把經驗所得，在學期就要開始的時候，寫出來供大家的參考，並請大家指教。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

「中國婦女生活史」都犯這個毛病，凡爾丁一書且有故意歪曲事實來替婦女運動張目的嫌疑。

不過，上文已經提到，重男輕女的積習是應當革除的。男女有根性上的不同，是不錯的，在社會生活裏男女大體上會趨於分工，也是不錯的，然而雙方都是人，都具有人的性格，誰都不是誰的工具，不是附屬品，終究是一個更大的事實。婦女運動所以成爲一種抗議的運動，在這一點上是絕對的有理由的。運動發軔期間的「女權宣言」最有力的根據也就是這個理由。

家庭革命的論點在中國比較發達，甚至於畸形的發達。中國女子，除了妻子的地位而外，幾乎沒有別的地位可言。當抗議的初期，這論點也是很有理由的。男子於做丈夫做父親而外，又有許多家庭以外的身份與活動，何以女子於做妻子做母親而外便沒有？而同是家庭的一員，同是建築成家庭的兩塊基石，何以男子可以娶妻，何以提出離婚，可以有家以外的性的自由？而女子比較沒有？同一講法的道德，何以單單的責成女子，而不責成男子？女子的要特別寬大？守節、守貞、一生不二的德操何以單單的責成女子，而不責成男子？不說別的題目，單單這一個性的題目已經足夠成爲革命的理由，教女子搗竿而起。

女子所以成爲家庭的動物，馴至家庭而外，更沒有其他活動的範圍與餘地，這其間也是一半由於積習，而一半由於自然的趨勢，積習應當改正，而自然的趨勢又是無可如何之事。女子因爲性生理的不同於男子，春機發陳(荷釋春機發動，今就中國舊有之醫學文獻酌改)以後，有月經的運行，結婚以後，又有懷妊、生育、哺乳一大串的生物的任務，而此種任務，前後又不一串而止，在生育力比較強大的女子，從結婚至月經停止，二三十年之間，可以完全沒有間歇；而當月經將絕未絕的少數年份裏，生理心理又大都需要一些休息與調攝的時間——這些，合併起來，就不免大大的緊縮了女子向外活動的範圍，比起男子來，教她不得不安於一種比較靜止的生活，而這種靜止的範圍與靜止的場合，不用說，就是家庭了。這就是自然趨勢的說法。這種自然的趨勢，有的固然可以不理會，例如月經，有的可以阻止使不發生，例如孕育哺乳；不過過分不理會與阻止的結果，小之可以影響女子個人的健康，大之可以危及種族的生命。言之，就是非理會而與以發生的機會不可，至少大多數的女子，爲了個人與種族的安全計，非順適此種自然的趨勢不可。其少數不能順適的勢不免被擠於自然演化的洪流之外，而歸於淘汰。

所論家庭革命的論點，到比可以分成兩部分說。一是對此種自然趨勢的革命，一是對積習的革命。我們根據上文的議論，可知對於前者的革命是必然的；對於後者，我們所能做到的是一些調適的努力，這種努力目前還極少，大約要上文所提到的第三個時期充分來到以後才有希望。不過對於積習的革命不是徒勞的。男權社會的演成，父權家庭的產出，一面雖依據自然趨勢，一面也未始不由於我們過分利用這種自然的趨勢，這種過分漁獵的

地方，就是我所稱的積習了。「易經」稱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大體上是對的，但若一方一味的始，一方一味的成，即一方一味的利於進取，一方一味的安於保守，那自然的趨勢便有變本加厲的危險。兩性的相與，本是一種荷子所稱的不同而和之局，變本加厲的結果是增加不同到一個有害於和的程度。這種危險無疑的是要加以消弭的。

與男子抗衡，對家庭革命，都是消極的論點。一到爭取女子個人的人格與適應社會的需求，就比較的積極了。前兩個論點所已使婦女運動收穫到的東西，是很籠統的，就是爭得了女子一般的人格。到此，所爭的便進一步而為每一個女子的個性化。在抗議時期裏，運用了最初兩個論點來從事運動，那從事的人無須太多，只要少數有魄力有見解的女子，登高一呼，據理力爭，便不難取得社會與文化的同情與承認。甚至於明白事理的男子也會替婦女仗義執言，來增加運動的聲勢，促進運動的成功，例如英國的穆勒約翰之流。到此，形勢也復一變，一方面、參加的女子必須大量的增加，一方面、男子不能再越俎代謀、即在旁邊打幾聲鑼鼓，那效力也很有限制。更重要的一層是，第一時期可以用議論取勝，到此便不能不用事實證明，第一時期裏，只要有人鳴金擊鼓，到此便非切實作戰不可了。換言之，到此，必須有比較大量的女子分別的把自己所有的本領拿出來，為的是要證明，凡屬男子所有的能力，她們也有，男子所能勝任的事業，她們也能勝任。

這第二期的運動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是相當的成功。第一步，教育機會的爭取，可以說還是屬於第一時期的努力，但第二步，教育機會的利用，與第三步，教育結果的運用，却完全是屬於這第二時期的。這些，都不能不說是相當的如願以償的。教育機會的利用，無論在為女子專設的學校裏，或在男女共讀的學校裏，已經充分的證明女子和男子同樣的有個性，此種個性同樣的有發展的可能與必要。智力測驗如此證明，各種特殊才能的測驗，以及各種學科的成績，大體上也證明如此；至於教育結果的運用更事實勝於雄辯的證明。這這一點。歷年以來，婦女從事於家庭以外的職業的人數，一天大似一天，延用的女子職業的門類，也一天多似一天；如果女子的個性不夠發達，不足以利用一切教育的機會，對於各種職業不足以勝任愉快，這種日增月盛的光景，是不會發生的。至於一部分的職業，例如教育、醫事衛生、社會工作，女子參加的人數往往超越男子之上，工作的效率也往往比男子為高，更證明了以前那種近禁錮的政策是一個歷史上的錯誤。

上文這一段話事實上已經把箇人與社會需求的兩個論點兼提並顧，似乎無須再分別的加以討論。不過，社會需要的一個論點好比家庭革命的論點一樣，在中國似乎是特別的有力，而其原因也正復相同。就是，以前家庭的禁錮越嚴，今日向社會尋求解放的動力自越不可遏。壓抑於內的『潛能』越多，則發揮在外的『動能』越大，原是一層單純的力學的原理。所以二三十年來，社會服務的呼聲，在中國婦女運動裏是有很大的地位的。女子之所以爭取教育機會，為此；女子於完成教育之後，遲遲不肯結婚，也為此；有的女子，到了結婚的前夕，為此不得不和未來的丈夫約法三章，於婚後仍須維持她原有的職業的位置，繼續她服務的精神。又有特別開明的新娘，在婚禮席上致詞，為此不免作一些公開的申明，說她對於服務的意志決不因婚姻而動搖，對於服務的勞績，當亦不因婚姻而減色。一種信誓旦旦的態度與辭氣，在這種場合上應當為婚姻關係而發的，她們却為社會服務而發，真是得未曾有，令人肅然起敬。自從抗戰以來，因為社會上人力不敷分配，這論點自更見得振振有詞，發人深省。

不過，這是一個很大的『不過』，在這種論點之下，社會與文化雖有時多少佔了一些便宜，這種便宜並不是絕對的，即有一方佔便宜，有另一方要吃虧，這另一方是誰呢？不是別的，就是女子自己。女子所吃的虧是從三個不同的方向來的。一可以說是由於力不從

心。在第一個時期裏，她的努力只限於心思的一方面，所費的往往祇是一些口舌與筆墨的工夫，當時的問題比較簡單。到了第二個時期，這種努力便不限於心思的一方面，而漸涉到體力一方面。論心思才智，男女大體上是平均的；在智力的變異性一層上，男女可能有些不同，但在平時的社會生活裏，這種不同也並沒有多大的實際影響；但體力的高下有差，至少適合於男子體力的許多工作與活動未必適合於女子的體力，却是一大事實；實際的體力不能應付，而多年來婦女運動所已養成的意志非教她應付不可，結果便非吃虧不可了。這一層，凡屬在男女共同工作的場合裏，例如學校、工廠、商店等，已經積聚了不少的資料，可資證明。女子所吃的第二種虧是由於情緒生活受忽略而來的。男女的性別不同，情緒也不同，而一般的情緒也就不同。女子善懷，女子多愁善病，原是一個極古老的觀察，近代性心理學家也說，『女子往往用情緒來解釋理智』。近代的教育是誰都承認只重理智而不問情緒的，這種教育，即就男子而論，已經是極不相宜，而自第二期的婦女運動以來，女子所爭得的教育恰好就是這偏頗的一套，結果的比男子更不健全，自是可想而知。性心理學家的結論是，由於這種教育，『一種不和諧不調和的趨向便會發生，馴至使人格受局部的損傷或全部的破碎』（詳拙譯謫理士性的教育，頁七八）。至於獨身，遲婚，不生育或生育過遲種種現象的發生，使性的生活以及母愛的傾向不能有適當的發展與滿足，轉而影響到一般生活的健康，便是女子所吃的第三方面的虧了。

綜合三方面說，婦女運動的結果，特別到了第二時期，就女子自身說，是以解放、獨立、自由、平等一類的虛名換得了生理與心理健康這嚴重的威脅的實害。其間原因雖不止一端，其主因所在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舍己從人』。『從人』，指的是運動的目標端在『思齊』男子，不惜以男子的標準為標準，惟恐自己的活動範圍受了限制，以致趕不上男子的那般寬大。中國的婦女運動從開始的時候便反對所謂『三從四德』，那是很合理的，不過從『從父，從夫，從子』的三從換取了『從男』的一從，儘管『從』字的解釋略有廣狹的不同以及主動與被動的分別，在明眼人看來，不免覺得收穫終究有限。至於『舍己』，指的是婦女運動始終忽略了女子的本性，以完全把這性性格忘記了；即或不忘記，又往往剛愎自用的認為無足重輕，甚或以為完全屬於後天獲得的品格，而並不是真正的本性。關於這一層，目前的篇幅不容許我作比較詳細的解釋，我姑且再引性心理學家謫理士的一段比較長的結論，以示此種本性的存在，而不容忽視。謫理士說，『當務之急，在要讓大家都知道女子有女子的特殊需要，好比男子有男子的特殊需要一樣，要是不能顧到這種特殊需要，而強其接受適用於男子的一些原則限制，則不特對於女子自身有害，對於社會生活全般也是毫無益處。我們對於男子也可以說同樣的話，總之，男女之間，無論在學校或社會上，我們雖則希望他們能共同工作，相須相成，但彼此所由達到生活的軌的路徑，必因天性的不同而有歧異，勉勵的能否到達，即志能否適逢這天性的法則為斷。我們在這裏要牢記住的一點是，女子之於男子，不但軀體比較短小，組織比較細膩，並且她們生活的重心又極容易受一種富有節奏的性的波浪所震撼動搖，這種重心易受顛簸的現象，在男子可以說完全沒有；而在女子，却幾於無時無刻不受它的支配。所以名為同是圓圓方趾，而實則女子的生活，好比一座持平的戲子，動不動便不能有保持均勢的危險——無論大腦也能，或神經系統的全部也能，或肌肉部分也能，只要受一些有分量的壓迫，便要比男子容易引起嚴重的紛亂。上文所謂特殊的需要，與此種需要的不能不體貼在此。』（拙譯性的教育，頁七四—七五。）這一番話事實上就等於上文『吃虧』之論

的一個綜合的敘述，而於情緒生活的最容易吃虧一層，說得尤其切實。討論到此，我們至少在理論上已經進入婦女運動應有的第三個時期，就是以女子自身

的健康為唯一的論點的時期。至於如何使理論演成實際，我們在這裏只能作一些原則上的提示，詳細的節目終必有待於女子的自覺與自來多福的努力。第一個極單純的原則是，我們一面對於男重女輕，男外女內一類變本加厲的積習雖應竭力的破除，一面對於上文所再三論到的自然的趨勢，包括生物學上兩性分化的基本事實，却仍宜充分的尊重；橫加抹殺，或熟視無睹，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第二、既承認生物的分化，便不能不承認社會的分工；這分工當然不是絕對的，好比分化原不是絕對的一樣。男女同是人，男女都有個性的變異，是雖異而同一方面；男有男性，女有女性，而個性的變異又往往因性別而互有不同的表現，又是雖同而異的一方面；所謂分化的不絕對在此。如何斟酌於分化的同異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補義

(下)

張東蓀

§七 我在書中曾強調有這些事情是與理論無關的。上述的這些革命內部自己造出來的困難亦是與理論不相干。以慾望而論，按照社會主義的正軌來說，本來是把勞動時間縮短，每人只做二三小時，餘下來的生活即可從事于「移升」(sublimation 舊譯昇華)。或從事于音樂，或繪畫，或科學研究。這便是一方面杜塞了物質慾的畸形發展，解放了勞動的苦痛，俾得在他方面向文化有一個昇華作用。這是最高尚的理想，亦是最合理的辦法。無如現實人生尚不能一躍而躋。所以在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權力慾的偏向以及其鬥爭的尖銳化是不能由社會主義的理論負責任的。我在書中再三提及理論與現實之間必須有個銜接的具體辦法或制度。上述這些弊病都是出於沒有覓得一個適當的銜接辦法。或可說在銜接的中間制度上有了漏洞，出了毛病。所以我要奉勸今天前進的人士，連青年們在內，與其空彈高調的理想，反不如切切實實，負責任地去研究這個銜接的媒介辦法，務使其無流弊或少流弊。

產業最高度發展的國家尚沒有這樣的變化，情形究竟如何，我們無法懸斷。我們今天所見的只是一些產業落後的國家。上述的種種困難却和產業落後有密切關係。據我個人的想法，倘使產業落後的國家是以增加生產總量使一班人其分際。例如造房子用美國木料，衣服用美國的玻璃紗。諸如此類是要絕對禁止的。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必須保持國際出入的平衡。至于中國土產的綢緞，雖然高貴講究，却不須加以制裁。又如浴盆與抽水馬桶，劉緒貽先生以為錦上添花，我則以為只要不是外國貨，而為中國自製，則無反對必要。所以有人主張一律把生活拉平，大家只許穿布衣住茅棚，這是一種不通的議論。

我相信對於物質慾的差等不完全作絕對的打擊與禁阻，則權力慾的偏向的激發自會有相當的緩和與減低。因為在物質享受方面保留有相當的等差，乃是對於生產工作的努力之一種獎勵。當然除此以外尚可有名譽的獎勵。不過須知專靠名譽的獎勵是不行的，必須有實質的方面相輔而行。人們以自己的勞力取得其相當的報酬，在精神上是一種快愉。僅僅空的名譽不足相抵。這正是宜洩

之間，從而安排青年男女的教育，分配成年男女在社會上的作業，以及對於家庭子女的教育，執者宜乎共通，執者宜乎維持均勢，執者宜乎稍分賓主，執者宜乎由一方稍專責成——這便是所謂不絕對的社會分工了。男女的分化還有一種不絕對的所在，就是一部分男子有女子的性格，而一部分的女子有男子的性格，或更大一部分的男子間或有些女性的表現，雖非通例，為數亦不太小；對於這些，我們在分工的局面中，也宜預為之地。總之，我們的目的是使每一個人能得到他的適性而無礙於健康的地位，為女子設想如此，為男子設想也未嘗不如此。到此，不特婦女運動到達一個比較所謂理想的時期，就是家庭、社會、文化、民族的生活也就轉進一個更和諧更光明的境界。

其物質慾望之道。所以我們應得明白人們有慾望，並不可怕，而可怕的只是慾望在社會結構上不能協調。犧牲他人以滿足自己，其關鍵還是由于不把整個兒社會推向發展之途以進。倘能改向發展，則各人皆可有事做。各人有事可做，各人滿足其不害他人的自己慾望，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目的。社會主義並不主張抑止慾望與克制慾望，而却要使人們的慾望轉向。轉到向四方八面去發展。所以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否就看其能否使人們的慾望由于向各方面的發展而獲得免衝突到協調。倘使不了解此意，只知一味提倡經濟平等主義，這便是把物質慾堵住了，而任其趨于權力慾。因為不走向發展則只有加強控制。以控制代替發展便只有把大家都驅得走向權力的競爭，以致在權力方面鬥爭便起了尖銳化。權力上有一爭端，外來勢力的引誘便極容易進來，以致歷史上有所謂「反叛」事件層出不已。這却不可太單純，只責那些所謂反叛者，而應了解這樣的制度本身不無毛病。如果在權力慾方面再想加以堵塞，則應知既實行有計劃性的經濟，必須要有集權的政治，這就十二分困難了。換言之，即在經濟方面既受控制，則在政治方面自然容易使人們發揮其支配慾。原來支配慾是對人的，而物質慾却至少包有對物的成分在後。一個社會不能動員極大多數人對於物質方面努力去開拓，則終難免于偏向到往著支配人的方面去擠。所以提倡全民增產，向着自然界去開發，實在是一個轉化慾望的好方法。

§八 關於權力慾的問題並不如如此簡單。我們應得對於論壇上有人以為經濟平等與政治自由不能兩全的顧慮加以正視。事實上亦確是有一些問題。老實說，杜絕了一部分人發揮其不正常的物質慾，這固是好事，然而同時却讓另一部分人滋長了其支配慾，這乃仍是二五等子一十，其失維均了。所以我在上文說，一個革命往往于其過程則自己製造了，孕育了一些內在的困難，迫至成功上所有的求濟之法即是把政治建立于輿論上。換言之，即以輿論來監督政治。在此處的問題是如何乃成為完全自由的輿論，勢必把報紙、印刷所、與廣播電台等宣傳工具完全許人民自由使用，不為政府或在朝的政黨所壟斷。(共公集

會與公開演說更不必說了。) 主要之點還不僅在於使人民自由發表意見或主張，乃尤其在於使人民知各種事實的真相。我相信只要報道是真實的，人們的判斷大約不致相去太遠。一切主張上的不同大抵是出于以不同的報道為根據。故封閉消息與捏造新聞是自由之大敵。同時却又必配合有政治機構而能發揮這個精神的。當然必須有代議制度。代議制度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此點已早為一班學者所公認，似乎無用多說了。問題不在有無代議制度，而在于要甚麼樣子的代議制度。像土耳其那樣，故意在議會製造一個反對黨，這雖是效法英國，當然可有一些監督之用，然而却仍未直迫問題的中心。因為倘使執政的黨是以搞政治與謀生活連成一片，好像中國那樣，則反對的黨亦必想如法泡製。其結果不是為了搶政權，打得落花流水，便是大家協議分贓。所以問題的真正中心不在一黨與多黨之分，即不在有無反對黨。倘使幹政治的永遠是那些游離性或半游離性，流氓性或半流氓性的人們，多黨聯合固不免墮入于分贓，一黨包辦其結果亦必演為黨內派系紛爭。我說不在有無反對黨，却不包含以為一黨反而好些。總之，問題是在另一方面。

我以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最好是：于代議制度下實行職業代表，所謂職業代表，我的意思和普通所說的是有一些不同。普通只注重其產生，例如運輸業推選代表可選出會在交通界的官僚。不僅此也，且被推以後即不能再回到本行業，例如大學教授團體推出代表，參加立法行政，而這個代表即從此在政治上混下去了，不再回到學校教書。因此我主張必須使這些參與議會與政府機關的人們另有其本業，只在開會時或任職時幹政治，開會完了，任職期滿，依然退到本行。在本職業中必須把他的地位保留在那裏。大學教授好辦，可以請假一年或二三年。工廠裏的技師或農場中的農人亦必須如此辦。農人亦得罷退下來自己還是種田。最怕的是工人的代表一旦做過後，那從此不再是工人了。農人的代表雖本是農人，這一做代表，即脫離農業界。這樣乃是因活動政治而造成人民的游離性。由游離性便又造成流氓性。告成工人出身的流氓，與農人出身的流氓，以前雖是丁農，以後却並不是丁農。這種再不能回到本業的人們只好從此以後在政治上鬼混，將其生活基礎不能不建立于政治活動上。對於我所說的救濟法，或有人顧慮到人數太多，不易辦到。其實我所說的只限於行政上政務官與議會的代議，雖有各級，人數並不多，至於事務官即可做為一種職業看待，有保障，可能終身任了，當然不在此範圍以內，要行此法同時在物質方面又必須施行全體人民的社會保險制度。對於疾病，子女撫育，養老等等都不感到經濟的威脅。恐怕非如此不足以真正實現民主政治。凡辦不到如此的，我以為為多或少總有一些假民主成分在內。本書以體裁所格，對於這些點子，不能詳細論述，現在所說只是輪廓而已。要而言之，創造一個新文明，創造一個新社會，是不會憑空來的，依然與舊的相承接。不但人民還是那些人民，即從事於創造新的革命陣營中人們其血管中亦必多含多少舊有的渣滓或毒素，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我奉勸大家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這却決不

包含勸人只在旁邊說風涼話，不可誤會。) 不但在社會方面有舊的東西因襲下來，滲透於新的之中，即思想亦會變為出亂子的根原。所以思想方面的澄清亦是十分重要的。

§九 所要補充的已將說完，雖則尚有零零碎碎幾點，以其太小，即不一提到了。寫至此，承上海友人剪寄世紀評論第四卷第五期書評欄上所載夏炎德先生對於我此書之批評。夏先生對我深加獎讚，使我除感謝外，彌增慚愧。就中却頗有引伸之處，這些地方正是我應該補充上去的。好在夏先生的意思亦是他早已蓄在肚子裏的，並非看了拙書而始有。我二人既得到一個共鳴，則我既不辭掠美，把他的話抄在下面即等於我的話：

『張東蓀先生新寫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對於時下大家矚目的這兩大主義作了極透闢的解釋，在觀念混亂的中國，這種書是絕對地需要。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近代思想的兩種主潮，誰都應該有明確的認識。不過愈是普遍性的問題，愈容易被誤解曲解，而正確的解釋乃愈見其需要。』

我以為本書最可貴的地方在把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併為一論，而且指明它在根本上是異名同質的東西，這一點實看到了近代史的內層，著者覺得深有把握，纔下了這個斷案，確是一大手筆！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可以根據歷史用我自己的話來加以補充說明。

遠者不提，且從十八世紀的民主運動說起，法蘭西大革命是一個大規模的民主革命運動。所有的平民在反動勢力的淫威之下，受不了壓迫的苦痛，遂舉起喊出反專制、反迫害與反特權的口號，對準特權階級(君主、貴族、僧侶)革起命來。這裏面不祇是市民身分的資本家(即工商業者)，還有工人與農民的羣衆，智識階級更在裏面起着領導作用，可說是民主戰線的大聯合。他們的旗幟是爭自由，爭平等，爭人權，不但要求民主，實際還要求生活，蓋自由、平等與人權非但為民主的必要條件，同時只有這幾點爭到手大家生活纔有保障。在那次混合性的大革命中，市民階級或工農羣衆各曾盡多少力？爭民主或爭生活(社會主義之起點)各佔多少分？實在不易分明。因此某些歷史家咬定法國革命單是政治革命或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實忽視了革命的複雜成分。固然後來的事實，資產階級吃到革命的果實，而無產階級不曾有份，是大家所知道的，但却不能因此錯判那次革命的性質。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與英國改革，民主只成功了初步範圍僅及政治，因產業革命後新的生產工具歸資產主掌握，真正享到民主權利的只有他們，勞工們反受他們壓迫。於是很多人竟把民主制度撥給資本家，把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偶合當作正常聯繫，而把勞工階級爭政權爭生活的社會主義，反當作與民主不同甚至相反的運動。事情之背謬真理無有過於此者。另外有人因見社會主義注重經濟，故認為社會主義就是經濟的民主主義，這所犯的錯誤較小，而也須加以指出。因為社會主義不限於經濟方面，正如民主主義不限於政治方面一樣。所以把法國革命當作民主革命，把俄國革命當作社會革命，截然分出界限，是對裂了歷史的整個性與民主革命的繼續性，實際上他們所謂社會革命只是民主革命更擴大更深入的運動。歐文(Owen)、勃朗(Blanche)、馬克思與韋伯(Webber)的努力並不與盧梭、服爾德(Voltaire)、傑佛遜(Jefferson)相反。倒是在進一步做前人未做到的工作，他們是同一民主長流中的前浪與後浪。這個根本要點如果確定了，那末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歧異論、對立論以至民主

主義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與獨裁主義的必然聯繫論，這一切錯看歷史，觀念混雜的謬誤理論，便可一掃而空。而因此種謬誤認識的不良影響足使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互相傾軋鬧得分家，以至妨礙真正歷史任務的推進，故從理論上予以矯正，於實踐上有很大的用處。

惟其通透了一部歷史，東森先生始終沒有提出公式化的論調。譬如，為建立一個新社會制度，究用和平革命或暴力革命，完全要看環境來決定，事前很難預先確定，像考茨基 (Kautsky) 的反對用暴力或托洛茨基 (Trotsky) 的為暴力辯護都是呆板的公式論。倒是著者說得妥切：一切不幸都由革命者與反革命者雙方相煎而成，有很多感情相激的成分。我相信要是當年沙皇不用放逐與處殺的政策，說不定布爾什維克黨人也不用恐怖手段。就近的說，政治協商會議要是成功，就沒有這一次的自相殘殺。這些地方，不是理論，而是命運！

東森先生說「理想雖百分之百的美滿高尚，實不及其中的一分能拉到地上的之為可貴。」(頁三二)這是因為看到新制產生之不易，接着又說「但一拉下來却無不使理想打折或變顏色。」這是在慨歎理想與實踐之難得一致。他看到馬克思的原意想實行世界革命，而到斯大林手裏却成了「一國社會主義」。這一點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斯大林未嘗不想實行世界革命，只是白審本國基礎未固，鹵莽從事，必連本國這點基礎也要破壞，所以一方面加緊作國內經濟的建設，同時對外一再揚言蘇聯的社會主義不是為輸出的，以祛除資本主義列強的疑忌，但一待羽翼豐滿，仍是要進行世界革命，所以第二國際的工作始終在那裏進行，後來形式上雖解散，而變相的組織仍存在，工作比以前更變本加厲，這是斯大林比托洛茨基現實的地方。問題是在共產國際的領袖始終跳不出莫斯科的圈子，而斯大林處處表現其一祖國至上」的現實作風，將其產才塗上了濃厚帝國主義色彩以後，共產主義先鋒手段還是目的，外間不無疑慮，即令贊同共產主義者也不甘坐受異國的支配。斯大林的現實做法，在開頭是有充的，本以後反而成為共產主義推廣的障礙。因而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女士堅持共產國際不應完全受蘇聯的支配的主張不行，就共產主義本身講也才不是一種損失。

馬克思主義乃西方文明之產物，而蘇聯制度在斯大林指導下却有顯著的東方性格，要將這種制度轉輸到西方或蘇聯以外的其他地區，而不能尊重各國環境與利益，定會感到格格不入。故東方的西方的協調折衷，實是今日社會主義的重要課題。

綜觀全書，著者以畢生治學的心得，對世局又那麼關心，內容確有許多獨到的地方。尤其可貴的是討論政治經濟的問題內不挾黨派偏見，保持純正學者的態度，言他所當言。裏面有許多主張與我平日所想的非常相合，其著作先問世，衷心殊感欣慰，

印度獨立一年

First Year of Independence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August 14, 1948

並不期然而然地夾入了些自己要說的話，對於著者亦彌增其企仰之懷。以他對於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淵博的學識，配得上稱通儒。當然以通儒論政並不就是主張「通儒政治」，我讀學東森先生原著還沒有發見這樣的主張。」

夏先生所說的中關於蘇聯，我有一點願藉此一提。即我以為其就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而言，不涉及其國際關係，蘇聯的制度固然是一個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但今天東歐和北歐各國，所實行的所謂新民主，亦是一種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決不是這種新民主只是達到蘇聯制度的過渡辦法。將來還必須變到蘇聯那樣，方可再進於社會主義。這却是一個大誤會。必須把這個誤會廓清，則夏先生所說的糾纏在理論一方面可以免除。這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所以附帶論之。

§十 最後我還要作一個附言，即等於跋尾。關於體例有一些說明。第一，原書有一附錄，是「廣獄生活簡記」，現在既把補義加進去了，勢必將附錄刪除。惟原序仍敘明有此附錄，以排版的緣故，不願將序文再改望讀者諒之。第二，是書中未曾提到英國的溫和性社會主義的實驗，似乎應有一個辯解。最近會昭倫先生來信，即以爲這是美中不足。不過我個人亦有一個見解。我以為就人類而汎言之，英國的辦法當然是最好的。我決不像有些時流論客一樣，抱着偏見。只因英國人有其特殊的民族性，而這個民族的性格却和中國比較上相遠一些。本來俄國美國法國以及東歐各國，那一國亦都有其民族的特性。中國本來不應該純粹取法於那一國。因爲凡是一個改革總是由其本國的內部自身需要來決定，不應該向任何國看齐。不過却可把他國所實行的拿來作爲鏡鑑。尤其是他國實行而失敗的試驗更具有教訓的意義。就是因爲從正面不如從反面獲益爲多。人家已經試驗過了證明其不行，我們不必再來試一番。本來政治經濟社會的施設是帶有嘗試性的，誰也沒有絕對把握，最需要的是發見過失立即改正，誰能改得愈徹底愈迅速，誰即能成功。千萬不可怕傷自己的尊嚴，拒絕歷史給人類的寶貴教訓。所以本書不談英國的辦法，其原因即在此。施復亮先生亦曾作文介紹拙書，指出我此書特別富有教育的意義。施先生的盛意自是可感。他的話大約想係指這些地方而言。我只希望今天關心或與聞整個中國命運的人，不論成年或青年，都能將其固有的反覆思考能力發揮出來，以悲憫的胸襟以迎接這個世界大變局。倘我這個希望不爲非當，諸位先生定能較我有更大的貢獻，使此希望不致落空。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日補寫完畢

英國離開印度剛十二個月，對此我們大家至少都應當引以爲念的。如果我們(英國)那時不離開印度，我們現在會捲入了一個同時對回教和印度教羣衆的戰爭。想再度控

制印度是不可能的了。這種企圖不是我們的人力物力所能支持的，而且日夜會引起我們良心上的不安。我們居然及時抽身，能在友誼的氣氛裏分手，使很多惡意的預言成

爲虛妄。即便現在這廣大的土地上發生着一切可憎的事，內戰、饑荒、和暴亂，讓我們不要因之悔恨我們的決定，印度和巴基斯坦終究會自己解決他們的困難的。印度的生

命被英國統治所關割已經有兩百年了。他們的經濟和人口問題，他們的社會分化被英國的征服加深了嚴重性。英國在印度所做的那些好的事情，不但沒有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反而促進了人口比生產增加更快的基本病症。兩百年來所關割的問題遲早必須應付的。如果那些有能力，有覺悟但是政治上缺乏經驗的人才集中他們的注意在趕走英國統治的事業上，他們將沒有餘力來應付這些基本的問題。

獨立以來的一年已經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成績。這片廣袤的大陸上並沒有像有些人所預言的成為巴爾幹第二。幾百個小邦中祇有兩個，喀什米爾和海達拉巴（Kashmir, Hyderabad），沒有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我們可以認為新憲法並不能令人滿意，他們的人民也還沒有從經濟剝削中得到解放。但是 Patel, Menon 和 Mombatten 在政治上的成就實在已超過了十二個月以前所敢逆料的程度。這一片大陸祇分成了兩個單位，並沒成為了幾百個分裂的邦國。

在獨立紀念日，這是我們可以稱道的成就。我們還可以加上一點，雖則在旁遮普（Punjab）發生過可怕的屠殺事件，大體上在這轉變和分裂的過程中，並沒有像一般預料的那樣流血。除了比預料為好之外，我們必須承認前途是黯淡的，和歐洲一樣的黯淡。印回的衝突阻礙了社會改良和經濟提高的計劃。依我們看來，印度決定要包括喀什米爾是不智的。他既然同意了巴基斯坦的獨立，聰明的話，就不必爭這地方，因為巴基斯坦早就把這地方打算在自己的版圖裏；從自然地理說，它也是屬於北部區域的。但是印度對這地方却不肯放鬆，甘地和尼赫魯從沒有希望過印回的分治。他們自然歡迎回教眾羣所擁護的，又主張社會改革的首相，像 Sheikh Abdullah 加自己的集團。巴基斯坦所採取的行動也完全錯誤，它放縱部落的戰士越過疆界，起初還是偷偷地幹，現在却明目張膽的遣派正式軍隊去進行侵略了。結果，印回兩個自治領不宜而戰，把本來可用來作其他有益事業的人力物力，浪費在這種戰爭裏。印度在這戰爭裏每星期至少要費十萬磅。印度的人民

慶祝着他們擊敗巴基斯坦的消息，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這種勝利是不重要的，因為如果他們繼續和這好戰的回教遊牧民族在山地裏打仗，對方可以維持遊擊性的抵抗，一直不會有結束的時候。我們祇有希望印回兩邦能在聯合國協助之下早些獲得和解。

為印度着想，還有個理由需要早些解決喀什米爾的糾紛。海達拉巴的 Nizam 族已經兩度和德里當局同意了合理的解決方案，但是又藉端不肯履行條件。印度對它的封鎖並不能使它屈服。對於印度說，在他腹部的那個相當大的區域在經濟上斷了交流是很大的損失。如果他專門對付 Nizam，不分心於喀什米爾，他不致把問題拖延得這樣久，以致情形日趨複雜。現在 Nizam 的力量因為極端派組織了突擊隊而增加了，巴基斯坦更用了空運輸入軍備，邊界上種族和社會的衝突正在蔓延中。原來的和談已因極端派的得勢而停頓。如果印度軍隊衝入 Nizam 的領域，海達拉巴之內的印回就可能發生仇殺，於是印度境內的印度教徒就會屠殺回教徒，巴基斯坦境內的回教徒也會屠殺起印度教徒來了。

這種亂局到現在還沒有發生的原因是雙方領袖明白印回戰爭的結果雙方都不會得到勝利，祇是給共產主義發展的機會罷了。在馬德拉斯（Madras）和海達拉巴的邊境上已有兩個地方，共產黨在進行不公開的土地重分配。很多非共黨的觀察者，包括許多外籍人士，都同意：一旦這種戰爭發生了，共黨領袖的成功是惟一可能的結果。共黨領袖看得最明白，羣衆的興趣並不是那個宗教取得優勢，而是農民從貧窮和剝削中得到解放。

甘地的被刺從多方面看來都是一件印度的災難。溫和的影響被取消了，和平的焦點被移去了。但是甘地太偏重宗教，對社會問題並不夠注重。他最後的一年甚至支持物價管制的取消，坦護了最反動的商業集團。結果極壞：物價上升，囤積和投機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社會黨沒有力量。它沒有健全的機構，以致他們的領袖尼赫魯進一步的右傾，支持着和他一生所標榜的信仰相反的政策。印度政

府很快的跌入了金融勢力的手掌裏；它對於極右派已無法對抗，甚至不像會對謀刺甘地的反動組織採取嚴厲的手段了。甘地謀殺案的進展沒有多少人能感到滿意。這反動團體中有一個主要的領袖名字叫 Savarkar，他被檢舉了。在審問時，發現了現在物資部長 Mukejee 在上任前曾向 Savarkar 請求他的批准。這件事的發覺，却並沒有影響物資部長的地位，足見政府將對極右派加以鎮壓的預料是不正確了。相反的，政府的壓力却指向左派。不但印度很多地方已經拘捕共產黨員，而且正在援引公共安全法的第四款，凡是批評政府的出版物將加以封鎖。大量的使用警察力量也已經引起司法當局的反對，尤其是孟加拉和孟買的首席法官曾加以嚴重的指斥。他們抗議警察不經審判拘捕人民，甚至把法院認為無罪的人再度拘捕。自由主義者和公正人士已經警覺政府在防共的名義下在設法確立反動的商業集團和極端主義者的勢力。

一位有經驗的英國駐印記者曾報導說：
我和其他的朋友們愈來愈覺得今天的印度和俄國小說中所描寫革命前夕的情形太相像了。一樣的失望，一樣的議論紛紛，一樣的無恥的發財，一樣的滿街是官僚，一樣的大家爭着向政府裏鑽營。更一樣的是共產黨，不論怎樣禁止和壓迫，日見壯大。官方的工會被人所厭惡而譏笑，共產黨所控制的全印工會却成了印度工人真正的組織。

這個比較當然有過火之處，印度和巴基斯坦快到共產革命的邊緣的說法還嫌太早。這種可能祇會發生在世界戰爭或印回戰爭裏。巴基斯坦在經濟上還是個封建王國，除了在西北邊境上開始有一些革命的情緒。另一方面看，右派的勢力却在長大，他們不但要壓迫暴力革命，甚至和平的改革都不肯放鬆的。而且三萬萬的印度農民還在半原始的生活中，他們的韌性和惰性之強真不易估計。比宗教分歧更深的社會衝突離着解決的時候似乎還遠，其間可能還有無數的血要流。以目前的情形說，印度需要一個不依賴莫斯科的社會革命黨，能為人權的保障，印回和平，和社會開放而奮鬥。（歐奈特約譯者譯）

知識·生活·宇宙

人類認識宇宙的動機

愈是在原始的社會裏，人類知識活動與生活的關係，

愈是直接緊密。因為在此種社會裏：一方面，人類的生活，乃是一種與自然界以及異族不斷劇烈鬥爭的過程，人類沒有閒情逸致去追求與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知識；另一方

面，當時的文化基礎貧弱，人們利用已有文字與語言等，尚難創造與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抽象知識。因此原始人類的知識活動，大都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而起的。比如玻里

劉緒貽

尼西亞人 (Polynesians) 住在海島上，靠打漁過活，爲了航海時定向的緣故，遂產生了對於星底方位的知識；新西蘭毛利人 (Maori) 對於星底的知識，也是由其對於農業的關係而來。哀斯基摩人 (Eskimo) 住在冰天雪地裏，遷徙無常，其所儲藏的食物，到了冬天，往往爲冰雪掩蓋，不便尋覓，所以他們在夏天的時候，對於其居住地域的地理知識，必定盡量搜集，以免在積雪之中迷失了方向，生活受到威脅。這樣的例子在原始文化中所在皆是，所以人類學家路威 (R. H. Lowie) 認爲：原始人類對於知識的興趣是實際的，而不是抽象的；他們僅僅是爲了滿足當前的生活需要，才尋求知識。(見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第十八章)

兒童，愈是幼小的兒童，對於知識的興趣，愈像原始人類一樣。他們之所以尋求知識，也是因爲知識可以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並促進生活上的滿足。比如蜂可以螫人是一種知識，小孩子有了這種知識，便可以避免蜂螫的痛苦；排泄有一定的時間與地點，小孩子有了這一種知識，便可以少受大人的責罰；一個熟識大人心理的小孩子，其生活比較一個對於大人心理茫無所知的小孩子，往往要從心所欲些。所以我們說，小孩子的尋求知識，也是爲了要生活得舒服些，至少是要生活得下去。

從原始人類與幼兒來看人類的知識活動，我們可以瞭解，人類知識活動的起源，乃是人類要求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實際生活問題的結果。和猩猩爲了要吃它拿不着的香蕉，於是學得了接竿竿、疊梯子的知識一樣。(人類學家動物心理學家爲了研究動物的智力，把香竹放在黑猩猩拿不着的地方，但同時放上幾個木箱子，或幾根竿竿，把箱子一起或把竿竿接起，便可以取得香蕉。結果證明，黑猩猩有利用此種工具以取得香蕉的智力。) 黑猩猩把木箱疊起，把竿竿接起，可以得到吃香蕉的滿足。人類爲了解決生活問題所得到的各種知識，也一樣的增加人類生活的滿足與安全；而且，此種知識愈豐富，人類生活的滿足與安全愈增加。所以人類爲了增加生活的滿足與安全，乃不斷的擴張其知識活動。後來，由於文化的進展，到了社會財富足以養活一批專門以知識活動爲業的人時，這種知識活動的擴張範圍愈大，就是一些與生活無直接關係的知識，也成了人類追求的對象。這種擴張範圍的速度愈快，知識與生活的關係愈間接。當這種範圍的擴張到了無限的時間與空間時，我們平常便把這種範圍叫做宇宙。如果有一種特殊的方法或觀點去尋求這種範圍，便是哲學家們所謂的宇宙觀或宇宙論。在知識生活發達的文化裏，大

都有這種以宇宙爲其知識活動的對象的知識份子。

兩種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

如前所說，人類社會中既然有專門以知識活動爲業，而不必慮慮到衣、食、住、行等實際生活問題的人，這些人從事於知識活動，對於與生活無直接關係的知識，自然更容易發生興趣；也容易盡量擴張其活動範圍，而直接以宇宙爲對象。不過，這種直接以宇宙爲對象，或說是直接從宇宙整體或本體下手的知識活動，其所用方法，大都是直覺的，圓圖吞棗的，因此，其所得結果，往往與宇宙實際不符，也與生活無關，或關係異常微弱。這話怎麼說呢？通常我們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是個無限大的東西，包括一切事物。對着這個無限大的東西，個人的時間、精力、與智慧，簡直是無限的渺小，和無限的短暫。我們要想用這種無限渺小和短暫去瞭解那個無限的空間與時間，簡直是不可能。如果我們一定要企圖去瞭解，只有把宇宙分成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片然後各人竭盡平生氣力，將這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片然後各清楚，等到積年累月，從事瞭解這種無限小的一點點，一片片的人到了無限多的時候，則整個宇宙，也許有被瞭解的一天。這是科學家尋求宇宙步驟，是從宇宙的各個部份以認識宇宙的全體。不過，這裏也許有的人要問，宇宙雖大，雖然包羅萬象，但究竟其中有些共同的原理原則，或者共同的基礎，這些原理原則或基礎，無微不至，藏在宇宙的各個部份，我們只要從宇宙某部份裏面尋出這些原理原則或基礎，便可以推想出整個宇宙的原理原則或基礎，用不着心勞力拙的去研究萬事萬物了。但是，即使如此，尋求萬事萬物的原理原則或基礎，也不能用直覺的方法。比如目前我們知道構成生命的基本物質是細胞，這是生物學家實事求是的研究過無數生物的構造的結果。從前王守仁不動手去「格」竹子，欲想坐在竹林下，用向心觀照的方法，找出竹子的一理一，然後再用竹子的一理一，加上用同樣方法找出的其他事物的「理一」，以求宇宙的基本原理，無怪乎他從開始便要失敗。何況，如果我們僅從研究竹子知道生命的基本物質是細胞，而不研究其他生物，我們也不敢說構成所有生命的基本物質是細胞呢？所以尋求宇宙的原理原則或基礎，除了不能用直覺的方法以外，還得要從萬事萬物下手。

用上述那種方法去認識宇宙，自然是一條悠遠而艱難的路，所以有些聰明過火的有開知識份子，便愛採用一種直覺的方法。這些人，也覺得個人的時間、精力、與智慧有限，決無了解宇宙萬象的能力，如果去強求，只有「一擲千金，轉陸沉」(陸九齡語)的份兒。可是他們却又不甘心自認渺小，在尋求宇宙的全盤知識活動中做一各小本，做一個螺釘；硬要一步登天，一手把宇宙抓住，看個清楚，看個底細。既然事實上不可能，他們便只好利用想像，(因爲想像自由的)在腦海中自己製造出一個宇宙或宇宙的本體。這個宇宙或宇宙的本體製造成功以後，他們便以爲是「頓悟」了，是「一旦豁然貫通，表裏精粗無不俱到」；換言之，人們只要向心觀照，一個渾融圓滿的整個宇宙，或一個清楚明晰的宇宙本體，便會從直覺裏跳到眼前，如此，人們便可以停止一切知識活動，安穩穩穩的去「自得其樂」了。這真是一種徹底的知識上的個人主義，在揭穿以後，知識份子應該認爲鑑戒的。

上面兩種尋求宇宙知識活動的不同，如果我們用愚公移山的故事來說明，更易了解。一座很大的山，要用一個人或幾個人把它移走，自然是不可能。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意識到了這種不可能，不願意動手去作，却靜坐下來，在腦海裏直覺的想出一套觀念，以爲只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山便可以移走了，當然不會成爲事實。而且，假如有志移山的人，大家都用這種方法，則無論多少人費多少時間，這山永遠也沒有被移去的可能。反之，雖然我們覺得我們一個人或幾個人不能把山移走，但却不氣餒，馬上動手去挑土，它移多少算多少，如果住在山脚的同時代人和後來的人，也感覺到山的阻礙，有志把它移去，這座山才可有慢慢移走的可能。自然，這是一條悠遠的路，何時走完或能否走完都是問題，但既然沒有其他的捷徑，我們如果真正把山移走，也只好效法愚公，忍耐着，忍耐着，走這條悠遠的，但却是可靠的路。移山如此，認識宇宙或宇宙本體更是如此。嚴格的說，世界上是不會有奇蹟的。用直覺的方法找出來的宇宙，只是與稚暉先生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一文裏所說的「漆黑一團」。換句話說，用直覺的方法認識宇宙，我們永遠也不能認識宇宙。如我們前面所分析，人類認識宇宙的動機，乃是人類要求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最後結果，既然用直覺的方法以認識宇宙的知識活動終不能認識宇宙，則此種知識活動的結果，自然不能幫助人類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實際的生活問題。所以許多哲學家們，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紀的以及受古代和中世紀傳統影響的哲學家們，其所找出的宇宙或宇宙本體，除了可以供少數有閒知識份子作思想遊戲或使之「心安理得」以外，對於解決生活問題，尤其是大眾的實際生活問題，往往是毫無作用，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半年來新疆情形綜合報導

觀察特約者

沉寂中的半年

(觀察迪化通信)

半年來新疆局面相當沉寂，所以很少寫通訊報告國人，這沉寂的原因：(一)伊、塔、阿三區和政府仍然保持和平對峙，彼此都未發動軍事攻勢，而談判恢復，又因雙方的距離太遠，無從實現。(二)地方民族的大多數，所關心的還是和平與生活保障，政治宣傳不足以鼓舞起他們來參與實際鬥爭，因之各地少有紛爭與較大事故。(三)政府確在開放政權，雖然民選的專員、縣長等未必盡按民主方式及這些官吏未必真能代表民意，但較之中國其他省份，却進步得多。(四)駐新疆軍隊雖仍由及民族主義者所反對，但這些國軍却在努力尋求與人民合作，這是進步的國民合作。(五)新疆當局對蘇聯力求親善，在各方面均避免與蘇聯發生衝突。

這不僅是說伊、塔、阿三區依然特殊化，就是政府控制的區內，民族間的關係依舊裂痕深重，地方人民對政府依舊未肯信任。譬如文化工作，有新疆省政府的宣傳委員會，有西北文化建設協會，有新疆日報。他們的種種文化活動雖多半以地方民族為對象，甚至派遣文化巡迴工作隊，工作於南北疆，但是地方民族中的知識份子決不與之合作，一般人民也只是於各種集會中，湊湊熱鬧，根本上對各項宣傳，等閒視之。又如經濟工作，技術輔導團工作尚未展開，去年成立的新疆建設委員會，只於各地成立分會而已；西北民生實業公司也不過運送畜牧貸款、商業貸款、建設貸款，獲得實益的仍不是廣大人民。內地的各項建設，影響於新疆者並不重大，但最近一月來世界已是局勢不安，新疆省商業銀行已開始向當局要求停止內地銀行在新疆作營業活動(中央銀行除外)。尤其重要的是，歷次赴內地觀光及出席國代或其會議的代表們，對內地政治、社會、經濟等現象，統無好感，對中國前途與對國家的信心都非常悲觀與淡薄，影響所及，至少地方民族中的首要，已在打自己的算盤。同時美國派武官赴新，對新疆之漸伸觸手與對新疆民族主義分子的接觸也足以引起蘇聯的警覺。因之，我們不能由於表面的沉寂，便放心說新疆問題大體已經解決，實則這不過是未來前途的隱憂期罷了。

但觀光及出席國代或其會議的代表們，對內地政治、社會、經濟等現象，統無好感，對中國前途與對國家的信心都非常悲觀與淡薄，影響所及，至少地方民族中的首要，已在打自己的算盤。同時美國派武官赴新，對新疆之漸伸觸手與對新疆民族主義分子的接觸也足以引起蘇聯的警覺。因之，我們不能由於表面的沉寂，便放心說新疆問題大體已經解決，實則這不過是未來前途的隱憂期罷了。

伊方最近的情況

情況

伊方方面，自從其參加政府的人士撤離迪化後，從未宣稱他們將與政府展開鬥爭，脫離中國，他們致張治中氏的信，一封已由政府公開發表，另一封政府曾發表其大要內容，伊方目前仍不願放棄和平，但堅持更易省主席，開羅被押回教團體所有人員、組織南疆民族保安部隊等為恢復和談的先決條件。

但在伊犁所控制的區域內，則絕不用中國的一切典章制度，他們仍是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用回教的紀年。一年來他們在增強生產，充實自己的力量。伊犁本是農產區，富源頗豐，經過一番努力，生產已漸達事變前水準。據云：中亞人民有一大批移來此間，協助生產工作。阿山方面，去歲烏斯滿曾率兵攻入承化，但不久即為來路不明之部隊擊退，事後哈薩克人民被殘殺者頗多，地方蕭條，可是中亞人民陸續移入，外蒙人民軍隊已進駐布爾津，金礦恢復開採。

因為哈薩克人多數不同情伊方，他們在伊、塔、阿三區內曾數次發動武裝暴動，未逃出者，頗受壓迫，他們的牧地與農田有的已為其他民族及新移入者佔據。伊方這一年來的肅清工作也有其功績，因為他們的消息封鎖得極嚴，不易獲得真象。

現在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阿加合江，維族人。他們的軍隊組織，最高者為總司令部，總司令是伊斯拉哈克江，也是維族人，駐在烏蘇。參謀長馬加諾夫，外籍，副司令哈因別克，均駐伊犁。在總司令部指揮下，有兩個步兵團，三個騎兵團，一個步兵訓練團，分駐於伊犁、塔城境內，阿山方面均係外蒙軍，不由總司令部指揮。每團人數多少不等，大約一個步兵團有一千六七百人，騎兵團有一千餘人，團以下為連，沒有營的建制，武器配備，不甚充實。他們駐在瑪納斯河西岸的，有時也沿着過河，與國軍小有接觸，即行退回。他們的兵源，除了就地方人民中徵和由中亞的柯爾克孜人補充外，過去曾誘引政府區內的維族青年逃往伊犁從軍，去歲逃往者不少。

政府方面

政府方面，維漢首領在過去一年中，表面上和中央派遣的人員合作表現，而思想的分歧，並小融化，去年七月一日維方自立的呼聲(維文)上曾為紀念和牛條款(字二)近有：(一)和牛條款是新疆和平的保障，但並未全部實現；(二)現在政府又給新疆人民頒佈許多法令，使人民陷入不安與恐怖狀態，他又想喚散我們的民族的團結與革命精神……政府又實行民族壓迫，將來有一天炸彈或許爆發的。新疆民族間的隔閡，有十年的歷史根基，非一朝的政策更改所能消除，回教民族在第一次大戰時曾有汎土爾運動，即結合全世界回教民族成立一聯合國家，這個運動帝德曾利用過，並因利用而支持過，不過民族的組成，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領土為主要條件之一，散處東亞的回教人民多無此種條件，惟有中亞，如新疆等地，信奉回教的民族在數量佔絕對多數，在語言上也多數屬於阿拉伯語系，他們進行民族大聯合是非常方便的。中央在最近二年來，對新疆問題縱有較深認識，對新疆地方民族處境，亦求全，可是國事如此，欲求和平，已不可能，縱然是政府在工作的計劃中，也在儘量看回教聯合國家的遠景，他們知道在目前脫離中國是不利的，可是他們卻不斷在追求那遠景，想一步一步地來實現那遠景，這不止是過去歷史束縛他們太緊及宗教信仰等關係，就是當前環境也使他们自覺：少數民族在多數民族統治的國內，有許多地方是妨礙其呼吸自由的，最近省府派長艾沙於某項會議內述及他一生從事民族解放的經過，他担保新疆不脫

看一角糜爛的內地

方朗

戰爭烽火遍地，內地糜爛日深，如果不諱疾忌言，這膏肓的病豈應當讓人知道。

這裏，內地的一角，四川渠縣，位於嘉陵江支流渠江與川鄂公路的交點。人口七十萬。年產蔗糖、菸草、黃花、白芍、米糧之類甚豐，號稱一等縣。地當大巴山防線的邊沿，南距傳聞中的中共華西總指揮部所在地的華蓋山僅百餘里，現已劃入九十七師方靖的轄區。

在抗戰期中，敵機曾光顧過二次，全城焚毀，至今遺燼不堪。市民誰都還留着當年火燒被天、血肉狼藉的深刻印象。但這印象是在一天一天的淡了，現實生活的刺激與壓榨，有增無減地迫使着人民走向窮困、痛苦、以至死亡，這不比數年前偶爾的空襲更可怕嗎？

這在行憲前三年多，這裏便開始了民選。由政府任人民費了若干周折才登記准了的公職候選人中，公布三五個人的保長、鄉鎮長、鄉鎮民代表或參議員的候選人名單，讓少數的人

去當選。除在公布名單前預備競選人得向民政科長進貢外，選舉時則操縱於地方派系的領袖和士劣袍哥之手，油大鈔票之後繼之以武力，參加選舉的鄉鎮民代表或參議員在前幾天就失去自由，分別的被各派系拘禁起來，直到用槍桿送入會場之後。今年年初號稱普選的國代和立委的選舉，全縣三十餘萬選民無法拘禁，但競選人以大量的法幣委託派系領袖組織選舉

在抗戰期中，敵機曾光顧過二次，全城焚毀，至今遺燼不堪。市民誰都還留着當年火燒被天、血肉狼藉的深刻印象。但這印象是在一天一天的淡了，現實生活的刺激與壓榨，有增無減地迫使着人民走向窮困、痛苦、以至死亡，這不比數年前偶爾的空襲更可怕嗎？

現在縣長劉炳中是一位青年的政校畢業生，但已是第二任。前任在開縣，共軍將劉伯承的故鄉，他說劉伯承在開共產，他的哥哥還在做大做其生意，為味不先革自己哥哥的命？他為政平穩，以運用地

那怕就是真正吸毒的烟

犯。其實，檢察處的檢察官×××夫婦就是兩副大轆，烟燈成天點着，常去的訪客都可以躺在燈邊閒談。前次，因為和警察局發生誤會，警局派人去捕捉×××，院中法警奉令抵抗，衝突入起，雙方各有二三人負傷，法院被燒，烟具奪回。此外這有一件更無法無天的事：看守所所長×××利用權勢誘發女犯成孕，因為怕事情暴露，乃囑託衛生院長監胎，服藥不見效，便在一個深夜施手術，嬰兒即成數塊取出，血流不止，一命嗚呼！第二天，事情噴了出來，全城轟動，但等到屍親控案時，證據烟沒，屍首已腐爛得無法驗傷而

握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据萬分由縣府再三派丁四出追收時，絕不繳歸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庫的縣行從中運用，不知拖到何時方可領得？目前稅捐處還保留了已被裁撤將近一年的六個分區主任及其所屬職員數十人，他們都是地方派系的有力分子，取銷不了。每區轄十餘鄉鎮，稅捐十之七八就握在他們的手裏。縣銀行呢？更在一個公開的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上自經理下至行員，無一人懂得甚麼叫銀行。一個稍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了三年多會計主任便由窮光蛋變為富翁。用金二百餘兩的富翁。用賦糧食管理處和人民的關係更密切，更是吸吮人民血汗的大本營。每年徵購期內的遍地怨聲不必言紀，只看大家爭奪各鄉徵購辦事處主任的激烈，就知道其中的甜頭。一個主任和他的屬員不僅和稅捐處分區主任及其屬員同樣祇填餉薪收據而實際並不領薪，事先的活動至少得計處五十石穀子。處長一節自然更肥，一年的田賦起收公布了的竟達七千餘石之多，而暗中浮派又從來無人清理。

離中國，但代新羅人民要求自由平等內外一致的權利，亦即要求各民族間的政治及其他各方面一律平等，真正平等。建設廳長伊敏在同一會議上也說，應該給新羅人民以當兵機會，這不但可減除內地軍隊駐新所需要的人民負擔，同時也可免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他又說，外來軍隊對當地人民如不信任，是很容易發生不良後果的。

以上所述可以略見在政府中工作的地方民族首領們的思想。至於漢人方面，政府中的主要工作人員對地方民族確在力謀合作，並極力在爭取安定時間，推行各項工作，然而半年以來，各方之配合仍不見佳，新羅的生活程度與西北其他各地比擬不高，但一般公教人員仍感苦痛，含污風氣與敷衍心理仍未肅清，半年來貪污案件曾牽涉到省委會高級官吏，盛世才時期所遺留下的各種活動資財，已被盜賣、浪費罄盡。說整肅人事關係妨礙了整肅；講突擊、敷衍心理渙散了突擊。除了軍屯工人在迪化收獲頗大外，其他庶政，多無起色。而地方民族間的派系之

爭，更是行政工作推動上的障礙。前一月哈薩克的一英雄——烏斯滿赴省，對政府表示一無話可說，哈薩克人是地方民族中對政府最感較好的，但他們去年入承化，損失頗重，認為政府不支控他們，同時這些草莽英雄們，自視頗高，不但政府不能控制他們，就是他們本身間也因地方士等觀念，不能合作，到今天倒成了政府最難處理的問題。

上月宋總司令內調，西北行轅副總司令，陶氏為人謙和，在西北多年，有婆婆之稱，對地方民族當能和平相處，我們預料，相對的和平還能維持下去。至於和伊方關係，政府將於民選省長工作完結後，再來和伊方談判，最近前國府委員鮑漢遠迪就選，因為鮑漢遠迪選為省長，伊方可能同意，但願前途，鮑氏恐無成功希望。

說此此為國華，突來蘇聯騎兵突入新境消息，這恐怕是中亞何爾克夜軍隊向此示威，或許是于狐主教飛進消息刺激起來的，事態不會擴大的。八月十八日

而地方民族間的派系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投考

會發

「方國秋！」
「有。」一個大約十八九歲的青年應了一聲，連忙伸手到窗口接到一張准考證，頭上滲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也不掏出毛巾來擦一擦，就急急地擠了出來。

「國秋！」
方國秋正走上十幾步，忽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叫他的名字。他仰起頭，向着身旁二行隊伍中尋覓，看見對面的行列中有一個人在笑向着他，原來是他這次在家同來投考的同學陳原。

「哦，是陳原兄。」方國秋擠了過去與他握手說。
「你也是今天來報名的嗎？怎麼這麼快辦好？」
「是的。」方國秋苦笑着說。「你說快嗎？我差不多等了二個鐘頭呢！你看，天氣這末熱，擠在人堆裏那末久，就弄的我滿身臭汗了。不錯，老張老李他們幾個呢？沒有來嗎？」

「他們托我代報，真麻煩！你看，我前面還有這末長陣人，又是雙行，等到甚麼時候啊！」陳原擡起眉頭說，「國秋，你准考證是幾號了？」
方國秋拿起手中的准考證看着，只見上面印着「報名號數第〇〇八七六五」字樣，隨說道：
「是八千七百六十五號。」

「呀！那末將近九千人？你看現在還有這許多人等着，截止日期是二十號，還有兩天呢！爲甚麼會這麼多人報考？」陳原驚訝地說。

「其實這並不希奇，我相信只要是公立校院都一樣會這樣擁擠的。私校收費那末重，誰不想往公立學校鑽？聽說很多私校讀了一年的學生，還來參加新生入學考試，願意在公立學校從頭唸起！」

「那末錄取成分是很少的了。」陳原說着，忽見前面的人在蠕動，中間留了一個空，他慌亂地步上前去，回頭對方國秋說：「你回去好了。」

「好！」方國秋應了一聲，隨即也跟上一步說：「如有

空到我住處坐坐罷。」

「好的！我們早就想到你處談談，住在那邊太苦悶了！」

「怎麼？」方國秋不禁奇怪地問。

「唉！幾個人住在人家店舖裏，多麼不方便？要讀一點書都不能夠。雖然是自己的同鄉，但是他們是做經紀的人，甚麼都……是嗎？那兒比得上你住在自己親姑母的家裏，多溫暖，又有表哥指教一切。這次我們一夥兒從鄉下出來，就是你最幸福。」陳原訴苦似的說。

「那兒話，其實我精神上也不痛快。出了門來總有許多不慣的地方，那兒會比家中交得溫暖？陳原，改天見罷，我得走了。」

「好，再見。」

「再見。」

方國秋回轉身來走着，只見報名的人越來越多了；行列一直接長下去。他們個個都睜大眼睛看着他，似乎羨慕他這樣快辦妥手續似的。

天氣非常炎熱，××大學新生入學考試，假座校中大禮堂爲第一試場，但是擠上了七八百名的考生，室中就如蒸籠一般的灼熱。然而這是最後一科的理化試驗，大家都低頭盡心解答，雖然汗流浹背，可是誰也沒有功夫放下手來扇涼一下。

方國秋坐在靠西窗的一個位子上，西照的太陽正猛烈的從窗口射了進來，曬得他眼花目眩，頭暈腦脹，週身發熱。他正苦思着第三條的化學和第五條的物理兩個難問題，抓不到一些要領。他想起昨天上午第一課考的數學，也有一條代數及一條三角無法解答出來，心中十分焦灼，他的眼睛瞪住試卷出神。

「請你出去吧！」靜靜的試場裏，忽傳來這一句話。方國秋猛地抬起頭來，但是在他左面二丈多遠的地方站着一個監考官，手中捧着一本厚厚裝訂起來的報名單，眼睛直瞪着他面前坐着一個青年。

「甚麼？」那個青年很惶恐地低聲的問。

「周平生是你嗎？你看這照片像嗎？」那監考官指着報名單上的照片說。

「……」那青年沒有說話了。祇慌慌的收拾了文具，站起身來，向着那監考官怒目看了一下就回身走了。全場跟着嗡嗡地響了起來。這時，忽然在講台上有一個四十多歲年紀的監考官，手中拿了一張大蒲扇，拚命搖了幾下叫道：

「諸位，請不要鬧！時間快到了。」他停了停又說道：「我們考試是力求嚴格的！惟嚴格纔會合理，纔會公平。這裏順便和諸位說，這次我們招考，發現有些考生不大守試場規則，我們都暗中記起來了，他們的試卷是要取銷的……」他不多說，好像很自重，惟恐會浪費考生的寶貴時間似的。

方國秋看了這幕趣劇，回頭仍在思索那兩個問題。可是腦中有如一張白紙，一點思路都沒有，心裏越發煩亂起來，只得把做好的答案重閱了一遍，補充了幾個字；索性不管那兩題，收起了筆墨，把卷子交了上去。

他從講台下下來，看見身旁那些考生的試卷上，也留了很大的空白，他不覺苦笑一下。忽然他瞥見陳原也正在他面前，他不敢跟他招呼，匆匆地出了試場，來到門外的一棵大榕樹下面，頓覺通身涼快，胸中悶氣全消，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方國秋從擁擠的公共汽車裏跳了下來，又弄的滿身大汗了。他急急地奔回他姑母家中，直走上樓，到他表兄岳周民的房裏。

「秋弟，怎麼弄成這樣子？快解衣罷！」岳周民坐在書桌前看書，回頭笑對國秋說。

「擠成這樣子呀！在試場裏擠，公共汽車裏更是擠！」方國秋一邊脫去外衣一邊說。

「哈哈！現在本是擠的社會呀！一週民笑了起來。

「這是好現象嗎？老實說，這是紛亂，是糟的表現！一國秋氣憤地說，把外衣向牀上一丟。

「不錯。我們不說這些了。我問你，今天又考得如何呢？」

「民哥，還不是一樣嗎？今天的理化纔做了三題，又有兩題像昨天的數學一樣，深奧的令人莫明其妙，無從着手，一個字也解答不出來。真想不到題目會難到如此！」方國秋坐在牀沿上說。

「其實要做到入學易畢業難纔是合理的！而現在是恰得其反。不過依目前實際情形看來，入學試題之難，也是不得已的，尤其是公立學校，招收名額有限，而幾千幾萬人投考，當然要把標準提高一點！一岳周民很正經的說。

「問題就在這一大批考不取的青年！私校讀不起，就業更難；我們都是沒有專門學識的高中生，連當小學教員都不夠資格！」方國秋哭喪着臉說。

「你說專門嗎？你知道現在就有不知多少大學畢業的

(下接第13頁)